

故宮藏四僧書畫全集 · 石濤 1

故宮藏四僧書畫全集 · 石濤 1

# 總目錄

前言

凡例

脫盡牢籠歸自然

王亦旻

圖版目錄

圖版

圖版說明

款識

印鑒

六一三 五九七 五五五 四一 三六 一〇 八六

故宮藏四僧書畫全集 · 石濤 1

## 編輯委員會

編委會主任：單霽翔

編委會副主任：王亞民 任萬平

周項立

編委（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亦曼

王琥

王靜

王躍工

呂成龍

朱藍

姜潤青

張光耀

許仲禮

曾君

楊丹霞

劉輝

魯穎

蘇怡

關琪

## 本卷主編

王亦曼



# 總目錄

前言

凡例

脫盡牢籠歸自然

王亦旻

圖版目錄

圖版

圖版說明

款識

印鑒

六一三 五九七 五五五 四一 三六 一〇 八六



## 前言

「四僧」是指我國明末清初時期弘仁、髡殘、八大山人、石濤這四位著名的僧人書畫家，他們並非出自同一畫派，但因其俱為僧侶或有為僧經歷，且其書畫藝術均能在「摹古」之風盛行的時代以造化為師，勇于創新，獨樹一幟。其書畫，各具鮮明的藝術個性和獨特的藝術思想，對有清以降的書畫影響深遠。

故宮博物院的館藏書畫作品以內府收藏為基礎，數量極為豐富，但如「四僧」，他們的書畫藝術雖然在清初之際獨樹一幟，却由於政治、藝術等方面的差异，而不被當時主流階層接受，故而在清代內府收藏中極為稀少，《石渠寶笈》中所著錄作品僅有三件半。但從新中國成立至今，故宮博物院通過政府部門撥交、文物商店收購、收藏家捐贈售讓等方式，使新的作品不斷入藏，補足了清代內府收藏的許多缺憾，其中「四僧」書畫藏品達到了現在二百餘件套的規模，經過了衆多前輩專家的鑒定和整理，無論是在作品數量，還是在質量、題材等各方面均為各館之冠。本次「故宮博物院藏四僧書畫展」在我院豐富的「四僧」藏品基礎上，精選了其中八十一件套重要作品，并通過諸如展廳氛圍烘托、器物搭配、景觀搭建等新穎的展陳方式，將「四僧」優秀的書畫藝術展示給大眾。

近年來，故宮博物院一直致力于向公眾傳播優秀傳統文化藝術，充分發揮了博物館宣傳、教化的重要功能，依靠自身豐富的館藏資源，通過展覽、出版、多媒體、文創等手段，將保存在這裏的古代文化藝術瑰寶真正為公眾所用。作為故宮博物院宣傳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故宮出版」代表著學術與品質。一直從未間斷的「名家大全集」的出版工程，伴隨着故宮博物院更加深化細致的展覽思路，更加服務于資料整理與呈現、學術研究以及更加貼近公眾需要的訴求，也越來越走向完

善。此次《故宮藏四僧書畫全集》的編纂，兼顧了以下幾個特點：

一、本全集除收入展覽中的作品外，還囊括了故宮博物院藏「四僧」書法、繪畫以及尺牘在內的全部真迹，是故宮歷次「四僧」題材出版中最為全面的一次，總數達到一百七十五件套。

二、各卷主編在對藏品深入研究的基礎上，以作品創作時代為序，本着逢文必錄、逢印必釋的原則，對入編作品的所有文字信息進行客觀、全面地著錄，著錄文字量達到八萬餘字，并附有故宮藏「四僧」書畫作品印鑒款識輯錄，這一編撰方式在故宮諸多全集、圖錄中尚屬首次。

三、在圖版部分，除盡可能保證圖像質量外，還將以往曾經出版但却未能完整出版的作品圖像補齊補全，使本全集達到了全面、詳細、客觀的反映「四僧」書畫作品的真實面貌。

「四僧」全集的出版，既是對故宮豐富館藏的展示，也是故宮扎實的文物整理、鑒定等基礎工作和深厚的學術研究水平的展示，隨着美術史研究的深入，對書畫流派等方面的研究向着更深入、更精微的方向努力是大趨勢，本套全集就是這一趨勢下階段性研究成果的呈現。希望能以此套全集為新的起點，令故宮書畫類展覽及出版物更上層樓，為廣大觀眾和讀者帶來更優質的觀展氛圍和藝術享受。

丁酉立夏

## 凡例

一 本套《故宮藏四僧書畫全集》共八卷，收錄故宮博物院藏弘仁（二卷）、髡殘（一卷）、八大山人（二卷）、石濤（三卷）四位僧人創作的書畫作品及尺牘、詩文札頁。全書由前言、凡例、論文、圖版目錄、圖版、圖版說明、款識、印鑒構成。

二 「四僧」之名源自這四位書畫家在明末清初之時皆有出家為僧的經歷，而且這四位畫僧一生所用各種字號較多，有的雖不見于作品款題，但當時流傳甚廣，更因文獻記載頻用而成為學術界較為一致的稱謂，如「髡殘」之名；有的雖非其僧名法號，但因在書畫作品款印中習見而被後人所熟知，如「八大山人」之名。故本書在確定作者之名時，或采用其知名度最高的一個稱呼，或選取其在書畫作品中最常用的落款，而非一定用其僧名，以方便廣大讀者的閱讀習慣。

三 故宮博物院所藏「四僧」作品，皆為一九四九年以後，通過政府部門撥交、文物商店收購，以及收藏家們以售讓或捐贈等方式入藏本院的。經過我院幾代專家的努力，對這些作品進行了鑑定與整理，本套《全集》收錄了其中全部確定為真迹的書畫和信札，以及個別名氣較大，但老一輩鑑定家有真偽爭議的作品。對於專家一致認定的贗品偽作，則不予收錄。

四 本套《全集》按「四僧」作者分卷。每家收錄的作品將書、畫合在一起，按照創作時間順序統一編排；無紀年的作品，根據其風格特點或相關內容推斷大致創作時間，繫于相近紀年作品之後；無法考訂其創作年代者，則統一置于各家作品最後。

五 本套《全集》收錄的內容包括每幅作品的圖版、基本信息、文字著錄、作者印鑒款識。其中文物圖版包括每件書畫作品的全形和局部，以及全部引首和題跋。在各家作品集最後，附錄該作者常用款識及印鑒，亦全部取自本《全集》所收之作品。

六 本套《全集》的文字著錄內容分為作品基本信息和款印題跋釋文兩部分。作品基本信息包

括：作品名稱、形制、質地、水墨或設色、尺寸等；款印題跋釋文包括：作者款題與鈐印、書法和信札內容、他人題跋及鑒藏印等。文字著錄本着有文必錄，逢印必釋的原則，對題識中涉及作品創作紀年的內容標注公元紀年和對應的年齡。印章除釋文外，註明印文爲朱文、白文或朱白文；聯珠印在印章釋文中以「、」表示區分。文字內容均以現代標點斷句，以便讀者參閱。

七 每件作品的文字著錄順序大致依據不同形制而定。手卷依次爲：本幅、引首、隔水、尾紙、內外題簽；冊頁依次爲：本幅、對題、裱邊、引首、附頁、內外題簽；立軸依次爲：本幅、上下詩堂、左右裱邊、內外題簽。

八 本書文字采用繁體豎排。在著錄的釋文與印文中，因原作作者用字情況非常複雜，難以統一，故本套《全集》對此作區別處理，除行草書寫法、避諱字等情況作標繁處理外，其他根據四僧各自的書寫習慣酌情加以保留，不作統一更改。

九 對于作品中抄錄前人詩文出現的脫衍倒訛等情況，均保留其原貌，不做統一與訂正。個別借助其他材料可明辨的誤字或缺字，或作者在作品上自行訂正的內容，均在此字後以「（）」標示出來。作品中款印模糊難辨、殘缺不全、無法釋讀者，以「□」標示；能作推斷的字，則在此字外加「□」，以示區別。

# 脫盡牢籠歸自然

——從故宮藏石濤作品看其詩畫人生

王亦旻

## 一 引論

石濤是中國藝術史上一位頗具研究話題的人物，他的身世經歷、佛老信仰、交游關係，畫理創新、詩文解讀、作品辨偽，無不令後世的書畫創作者、鑒藏者和研究者們着迷。他的這些話題之所

以會引起後世如此巨大的關注，正是源自他的書畫作品，在歷經三百多年的沉澱之後，依舊散發着無窮的魅力，給人以新鮮之感。

石濤作品中的這種魅力不僅體現在傳統與創新的完美結合上，更體現在詩境、書境和畫境的協調統一上；他的書論畫論，即便是片言隻語，亦能直指人心，引發藝術實踐者的共鳴，同時也成為很多研究者解讀其作品的一把鑰匙。三百年來，有關石濤書畫的評價日隆，對其作品的出版著錄與對其本人的研究論著亦汗牛充棟。但其中很多關鍵問題仍然無法解決，如其早年書畫的師承和學習經歷，

其傳世書畫和詩文作品的真偽，有關其晚年宗教信仰和藝術理念的解讀等等，都引起學界的廣泛探討，而結論往往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正如之前有學者指出的那樣，我們對石濤的研究仍處于初級階段，而這其中一個根本原因，便是研究的基礎工作仍舊薄弱。石濤的書畫作品是研究他的第一手資料，這些作品迄今散落世界各地，不要說能看到全部原件，就是清晰的圖片也是無法搜羅完備的，更不要說辦析其真偽了；而即便是已經出版發表的石濤作品，由於編輯或印刷等原因，也存在信息不清和不全的情況。因此，在原始資料不能全面準確掌握的情況下，任何人對石濤的研究都難免顧此失彼<sup>〔二〕</sup>。

石濤一生以畫會友，鬻畫爲生，作品數量巨大。迄今存世署其名款或通過印章與題跋可知爲他的書畫作品有一千餘件<sup>〔三〕</sup>，其中中國大陸各地博物館、文物商店等單位收藏，并經《中國古代書畫目錄》著錄的作品有二百五十五件套六百五十九件<sup>〔三〕</sup>，約占其存世作品數量的一半，這部分石濤作品基本是經過老一輩鑒定家鑒定後收入此書中的，雖部分作品仍存有疑問，但絕大部分屬學術界認可的石濤真迹。隨着故宮博物院文物藏品的增加，以及整理研究的深入，目前已確知故宮收藏的石濤書畫作品，包括尺牘信札，

〔二〕

參見肖燕翼《石濤書畫全集·敘論》，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  
這個統計包括海內外公私收藏且已確認爲石濤真迹，以及尚未確定其真偽的作品。  
按照博物館書畫文物的統計方式，一件八開的繪畫冊，是一件套，八件作品。

共計九十三件套二百八十九件，其中確定為真迹的有七十六件套二百四十二件<sup>〔四〕</sup>。較之《中國古代書畫目錄》著錄的故宮藏五十五件套二百一十二件多出不少，而此前有關院藏石濤作品的出版物中，較著名的如「故宮藏文物精品全集」之《四僧畫集》祇收錄繪畫作品而無書法作品，澳門藝術博物館所編《至人無法——故宮、上博珍藏八大、石濤書畫精品》與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所編《石濤書畫全集》，都是選取故宮所藏部分精品，并不能反映故宮所藏石濤書畫真迹的全貌。本次《故宮藏四僧書畫全集》中所收石濤作品，囊括這全部七十六件套書畫，并詳細著錄作品上的全部題識、款印、跋語和鑒藏印，將這些作品上的信息完整呈現給讀者，以期為學術界研究及愛好者欣賞這些石濤作品提供幫助。本文是在整理全部院藏石濤作品，同時學習前人研究成果後的一些心得，并不很成熟，聊作引玉之磚。

## 二 石濤作品中的人生軌跡與解讀

石濤一生經歷坎坷，生逢朝代鼎革之際，加之前朝皇族的敏感身份，自幼便生活在隱匿逃亡的環境中，非至親至交之人不敢透露其真實身份，即使是他的好友，也有意為其隱瞞一些實情，以至

于其生卒年都成了後人長期爭論的問題。徐邦達先生在《僧原濟生卒年歲新訂及其它》一文中<sup>〔五〕</sup>，于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石濤作品自題和相關文獻記載，考證其生卒年為（一六四二—一七〇七年），此論是建立在目前石濤真迹作品和可信史料之上，故現已被學界普遍接受，這也是我們認識石濤生平行實的出發點。經過前輩學者的研究，石濤一生的大致經歷已基本廓清。他原名朱若極，是明代第十三位靖江王朱亨嘉的長子，廣西桂林人。他出生兩年（一六四四年），明王朝便滅亡了。一年後其父在南明政權內部的爭鬥中失敗被殺，當時年僅四歲的石濤由家中僕臣背負逃出，避禍于廣西全州湘山寺，後出家為僧，法名原濟，字石濤；他的僕臣也一同出家，法名原亮，字喝濤。從此二人以佛門師兄弟相稱。十歲前後，石濤與喝濤北游荆楚之地，居武昌，游兩湖山川，習書學畫，頗具天賦。至二十歲前後，其畫作已知名于當地。二十三歲（一六六四年），兄弟二人離開武昌，先居廬山開先寺一年，後為了參習臨濟宗木陳道忞一派，從廬山順江而下，經南京，游松江至杭州，再由越中到宣城。期間，石濤與喝濤曾在松江同拜木陳派傳人旅庵本月為師，正式確立了在禪林中的地位。從一六六六年到一六七九年，石濤居安徽宣城十四年，在此結識了施閏章、吳肅公、梅清、梅庚等當地詩人畫家，經常與他們結伴游覽黃山、敬亭

〔四〕 其中一件《墨荷圖軸》有疑問，討論詳後，但因此件定為一級文物，故仍列入此次出版中。  
〔五〕 載徐邦達《歷代書畫家傳記考辨》一書中，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

山，一起詩文唱和，在繪畫創作上亦相互影響，于筆墨和構圖大膽求新。一六八〇年，石濤赴南京，居長干寺一枝閣，并于一六八四年在此寺中與衆僧一起迎駕康熙南巡，使他產生了北游京城之念。

一六八九年，石濤在揚州平山道再次接駕康熙南巡時，被康熙認出并叫出他的名字，令石濤倍感榮耀，由此更堅定了自己的詩畫作品贏得最高統治者認可的信心，遂于此年冬前往北京。但居京三年，石濤的藝術雖然受到博爾都、王鷺等王公大臣的賞識，却沒有得到

他想要的官方認可，于一六九二年冬離京南歸，回到揚州，隨後再次游歷黃山、真州等地。一六九六年冬，石濤在揚州建成大滌草堂，晚年定居于此，鬻畫爲生，直到去世。

石濤早年的身世和經歷，曾經是他刻意隱瞞的事情，直到晚年纔逐漸公開，并請其朋友爲自己做傳。石濤好友李鱗在《大滌子傳·序》中曾言及石濤「欲以其生平托予傳」<sup>〔六〕</sup>，江都員燉也提到石濤晚年的弟子洪正治（號陔華），曾得到石濤《自述》一篇，而且其內容「序次頗詳」<sup>〔七〕</sup>。石濤向朋友弟子所述自己的身世，不僅見諸于友人爲他所作的傳記中，也見諸于他自己的書畫作品上，但二者相比，亦有所出入或矛盾，即便如《瞎尊者傳》和

《大滌子傳》這種與石濤同時代的朋友所作的傳記，內容也有詳略不同，甚至缺失的地方。如他早年逃隱時期，出家的具體時間與地點；中年在南京和北京期間，對清王朝的態度；晚年歸隱揚州後，其佛道信仰是否發生變化等等。這些問題，既有因時代久遠而失之詳實，也有因政治宗教原因而曲爲迴護。通過對石濤各個時期作品的研究，有助于我們補足《傳記》中缺失的記載，釐清對這些問題的模糊認識。

首先，關於石濤的真實身份和幼年遭遇，隨着清王朝政策的寬鬆，其晚年的傳記中已可如實記述。如陳鼎的《瞎尊者傳》云：「瞎尊者，失其族名，廣西梧州人，前朝靖藩裔也。」<sup>〔八〕</sup>李鱗《大滌子傳》云：「大滌子者，原濟其名，字石濤，出自靖江王守謙之後。守謙，高皇帝之從孫也，洪武三年封靖江王，國于桂林。傳至明季，南京失守，王亨嘉以唐藩序不當立，不受詔。兩廣總制丁魁楚檄思恩參將陳邦傅率兵攻破之，執至閩，廢爲庶人，幽死。是時大滌子生始二歲，爲宮中僕臣負出，逃至武昌，剃髮爲僧。」<sup>〔九〕</sup>在石濤所作《詩畫合璧卷》中<sup>〔一〇〕</sup>，有其晚年書錄丁巳（一六七七年）夏日因石門鍾玉行到訪敬亭廣教寺所作詩一首。詩云：「板蕩

〔六〕 李鱗著《虬峰文集》卷十六，載《四庫禁毀叢刊》集部第一三一冊。

汪鋆集錄《清湘老人題記·附錄》，載《中國書畫全書》第八册，上海書畫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出版。

〔七〕 陳鼎著《留溪外傳》卷十八，載《叢書集成續編》第一五四冊，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本。

〔八〕 李鱗著《虬峰文集》卷十六。

〔九〕 此卷藏故宮博物院。本文後面所提到的石濤作品，祇要不特別注明，均爲故宮博物院所藏，并出

版于本套《故宮藏四僧書畫全集》之中。

無全宇，滄桑無安瀾。嗟予生不辰，齟齬遭險難。巢破卵亦隕，兄弟寧思完。百死偶未絕，披縑出塵寰。

南望傷夢魂，怛焉抱辛酸。故人出石門，高誼同丘山。竭來敬亭下，邂逅興長嘆。撫懷念舊尹，指陳同面看。宿昔稱通家，兩親極

交歡。鬚眉數如寫，氣骨恍來寒。翻然發愚蒙，感激摧心肝。識父自茲始，追相遙有端。便欲尋遺迹，從君石門還。一爲風木吟，白

日淒漫漫。」此卷是後人將石濤中年兩幅梅、竹之作與晚年三件書

法合裝而成，三件書法從其風格看屬同一時期作品，因其中有《南歸賦別金臺諸公》一詩，當是其從北京南歸之後所書。按詩中所

言，鍾玉行與石濤是通家之好，父一輩是「兩親極交歡」的友誼。

正是這層關係，勾起了石濤對幼年遭國變家變、喪父逃亡、被迫出家的回憶。此詩文句仍有隱意<sup>[二]</sup>，掩蓋了靖藩後裔的身份，但詩中前半部分的描述正與石濤幼年的險惡經歷相吻合，感歎自己「既失故鄉路，兼昧嚴父顏……」爲風木吟，白日淒漫漫，借對亡父的回憶，表明自己雖然對父親不了解，但人生歷程却是因父親的身份與遭遇而帶來徹底改變。

石濤晚年常在自己書畫作品上署款「極」或「若極」，鈐印「阿長」「贊之十世孫阿長」等<sup>[三]</sup>，來表明自己的真實身份。

〔二〕此詩序中有「言及先嚴作令貴邑時事」之語，韓林德先生在《石濤評傳》中認為「貴」是「桂」的諺音，「石門」乃暗指「全州」，可備一說，見第三章中第二小標題。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  
〔三〕朱贊儀爲明第一代靖江王，石濤是其十世孫，而且是朱亨嘉的長子，故小名亦稱「阿長」。  
〔四〕喝濤此印鈐于他所題跋的石濤《贈粲兮山水冊》上。

根據《筆嘯軒書畫錄》記載，這套冊頁共二十六開，載《中國書畫全書》第十四冊。這套冊頁目  
前分別藏于故宮博物院四開，藏于香港至樂樓二十二開。

但在石濤幼年時期，靖江王長子的身份給他帶來的却是死亡的威脅和九死一生的驚險歷程，最後不得不以落髮爲僧，更改籍貫來掩蓋真實身份。他給鍾玉行詩里所言「巢破卵亦隕，兄弟寧思完。百死偶未絕，披縑出塵寰」，正是這一經歷的寫照。在明末清初政權更迭的時候，很多不願降清的明室宗親和舊臣除了以死殉國，就祇能選擇隱藏身份，出家爲僧這一條路了，而石濤則要躲避來自清王朝和南明政權的雙重追殺。從石濤一生的作品看，他的款印中大多以

「清湘」（即全州在宋代的名稱）作自己的籍貫，從早年的「清湘濟」「清湘石濤」「清湘小乘客濟」「清湘瞎尊者」，到晚年的「清濟」「清湘半個漢」「清湘大滌子」「清湘老人極」「清湘老人阿長」等，在其早年所作《山水人物卷》和《贈粲兮山水冊》中，他還與喝濤原亮共用過一方「湘源谷口人」的印章<sup>[三]</sup>，湘源乃全州在隋唐時期的名稱。由此也可推定，石濤是把全州作爲自己再生之地。

至于他是在全州湘山寺避難時即已出家，還是如李鱣《大滌子傳》所言「逃至武昌，剃髮爲僧」的，似可做如下分析。石濤是四歲時逃至全州的，大約于十歲時離開全州，與喝濤北上荆楚之地。石濤晚年所畫《黃硯旅詩意山水圖冊》中有一開題云：「黃硯旅衡永道中，清湘拈筆夢游于五十年前矣。」<sup>[四]</sup>是回憶自己五十年前曾游

此地，據此冊中另一開所書年款爲壬午（一七〇二年），則石濤游衡岳當在一六五二年，故他離開全州不會晚過十一歲。而按照古代佛教律法中出家年齡不得小於七歲的規定，加之出行在外僧侶的身份更具掩護效果，故他很可能是七歲後、離開全州前這段時間在湘山寺出家爲僧的，這距他到武昌的時間也不是很長，李麟的記述可能將二者合在一起了。

其次，關於石濤中年在南京、北京時期，與清王朝的關係，是其晚年傳記中有意迴避的話題。李麟《大滌子傳》對這時期的記載非常簡略，祇是說：「（石濤）孤身至秦淮，養疾長干寺山上，危坐一龕。龕南向，自題曰：『壁立一枝。』金陵之人日造焉，皆閉目拒之。惟隱者張南村至，則出龕與之談，間并驢走鍾山，稽首于孝陵松樹下。其時自號『苦瓜和尚』，又號『清湘陳人』。住九年，復渡江而北，至燕京，觀天壽諸陵。留四年，南還。」陳鼎《瞎尊者傳》更是未言及他這一時期的行踪。顯然他們不願意提及石濤接駕康熙，游走于新朝權貴之間的事，爲此李麟于《傳》中特意突出石濤在南京拜謁明孝陵的活動，而把去北京也描寫成是爲了「觀天壽諸陵」。如此曲筆而書，一方面因二人的著作皆強調立傳的對象爲明代遺民身份；另一方面也是對晚年石濤公開靖藩後裔身份的尊重與維護。然而，從三十九歲移居南京，到五十一年離開北京南歸，這十餘年是石濤一生中心理起伏最大的階段，也是他藝術上孤高不群的個性與渴望獲得認可的心態交織影響最大的時期。

其實，無論是李麟還是陳鼎，都在《傳記》中提到石濤性格中孤僻不羣的一面。陳鼎《瞎尊者傳》云：「性耿介，不肯俯仰人。時而寥寥然，磊磊落落，高視一切；時而岸岸然，踽踽涼涼，不屑不潔，拒人千里外，若將浼之者。有道之士勿求可致，齷齪兒雖賄百鎰，彼閉目掉頭，求其睨而一視不可得。以故，君子則相愛，小人多惡之者。雖謗言盈耳，勿顧也。」李麟《大滌子傳》中也提到他在南京時，危坐龕中，拒見金陵來訪者。石濤幼年遭國變、家變，而被迫逃亡隱居，孤零漂泊的生活經歷或許是其孤僻性格形成的根源，同時這種「踽踽涼涼，拒人千里外」的性格對他的敏感身份也是一種保護。但石濤的本性並不是自我封閉的，而是渴望交朋友，渴望獲得認可。故他對交往的人是有所選擇的，對「有道之士勿求可致」，而對「齷齪兒雖賄百鎰」也不屑一顧。《大滌子傳》中記載他居武昌時，就「懷奇負氣，遇不平事，輒爲排解，得錢即散去，無所蓄」；在將要離開宣城赴金陵前昔，更是「洞開其寢室，授書厨鑰于素相往來者，盡生平所蓄書畫古玩器，任其取去」，這都顯示出他對朋友知己豪爽真誠的一面。在石濤題贈書畫的上款人中，雖然很多也是高官富賈、地位顯赫之人，但能夠理解石濤爲人，并欣賞其藝術品味，仍是其贈畫的主要條件。庚申（一六八〇年）秋仲，剛到金陵不久的石濤把自己早年所畫山水十頁贈與吳漿兮，即故宮所藏《贈漿兮山水冊》，并在此冊後題詩道：「君家鑒賞清且閑，不憑耳目憑溪山。爲君十出塵埃思，明月清尊一解顏。」第二